

中文版自序

这本 1999 年出版的英文《高家村》终于在十四年后有中文版了。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本书中文版的项目，因为内地和台湾的出版社都拒绝了。

根据我模糊的回忆，那个台湾出版社拒绝的理由是，一个小小村庄的个案研究对整个中国的理解意义不大。那怎么样才会意义大呢？把整个中国农村作为研究对象很难避免宏观和抽象化。很难想象出一本可以用实证材料全方位地描述或分析整个中国农村的书，因为中国太大，区域差别太繁杂。宏观和抽象的整个中国描述和分析似乎限定在某一学科范围内更可行，比如宏观经济学，或是宏观政治学。

本书试图做的是：以丰富的实证资料和跨学科的方法来全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一个村庄。《高家村》既是高家村的历史，也是高家村的政治，是高家村的社会学，也是高家村的人类学，同时也是高家村的经济学。除了用跨学科的方法解剖一个村庄，为读者提供洞见，使读者有一叶知秋的理解这一特点外，这本书还用每一章围绕一个主题的方法把高家村放在中国的大背景里来描写和分析。本书的主题包括人口、土地、教育、健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生活水准、改革、文化和风俗的传统

与变迁、高家村与外部世界等等。这样读者可以得到以点到面，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解。

内地的三联书店曾考虑出中文简体版，结果放弃了。估计是因为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讲文化大革命的。网上有传闻并登载高默波为《高家村》中文版写的序，说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所谓《高家村》中文版的序言实际上是我2001年为《读书》杂志写的小文，被人误传了。《读书》那篇介绍《高家村》的文章一出来就引起了《南方周末》的注意，并发出一个版面的文章，登了几个公知的批评。我猜测，他们几个人那时候没有一个看过原著。公平地说，他们不需要看原著就有理由和原因批判《高家村》，因为从《读书》的那篇文章里就可以看出，本书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制而写的。更使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本书没有采取否定的态度去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村教育和卫生健康情况。

大陆官方自从毛泽东去世后一直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官方定调的话语框框里，我们不少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把1966到1976这段时间定义为“十年浩劫”。按照官方定的话语来构建历史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但是我们不允许不同意见人说话的态度很彻底。说是“不争论”，实际上是不让不同意见的人争论。我们这些写官方历史的政治和知识精英认为，他们把握着真理的钥匙；他们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只有他们的经历才是历史的实质和原形；只有他们的意见才是历史最正确的解释。而且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宣称，他们说的故事代表中国，是全中国人民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躬身自省，使自己明白：相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工人和农村人来说，我们确实有写历史的特权和资源；但这不等于历史仅仅就是我们写的那样或这样。

中国寻求“真理”的“先知”们，包括共产党人，从五四运动以来总体上是强调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后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后知”们因为掌握“真理”而否定毛泽东，且进一步批判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

这种为中国现代化而作的知识努力当然是有其原因和道理的。但是如果这么一刀切地否定过去，中国人还剩下什么呢？

有国人抱怨说，中国在上世界上到处受抨击，天天在挨骂。中国在上世界上没有话语权。中国没有个说法。明显的是，在既否定自己的过去传统又否定自己的现代实践、抱着怨天尤人的文化和价值虚无主义态度的土壤里，是很难发展自己的话语的。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应该是媚权媚党，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权威和党派；但也不必因此就为反对而反对做研究。不管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如何，他或是她很难反驳的是，中国革命是几代人奋斗而选择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许多错误和悲剧，甚至有过后看来是犯罪的行为。但同时也有宝贵的奉献，积极的建造和由此带来的人类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大幅度上升，教育和健康水平的全面改善，妇女地位的急剧提高就是例子。这是中国人为现代化而努力的结果。这些努力和成果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一点也不逊色。怎么能就因为一时达不到历史上西方殖民国家在现时的人权和物质生活标准就全盘否定自己几代人的努力呢？

《高家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写的：不为反对而反对，也不为辩护而辩护。不为哪家主义做脚注，也不为哪门理论找证据；更不服从谁的政治需要。是问题就写问题，有成绩就说成绩，并尽量找出事件背后的根源。我不否认我写本书时有我的立场。没有立场和观点是不可能的。我争取做到的立场是底层的，观点是草根的。也就是说，我想站在高家村人的立场上，以高家人的观点来讲高家村的故事。我不想也没有资格做他们的代言人，但我想而且希望能做到从高家村的农村人立场和观点来看待和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我希望这么做的第一个原因是，我是在高家村出生和长大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这立场和观点与城市人，与中国精英文人的观点和立场是不一样的。

《高家村》所写的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到1996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出现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农村的教育和健康条件每况愈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沉重地压在农民的肩背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这些在《高家村》里反映出来了。但是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情况大有好转。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是取消了农业税。这可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也同时堵塞了地方政府以任何名义征税的路子。更可喜的是，对农业生产开始了有系统的补贴和资助。同时，中国政府对农村的教育、卫生和社保的改善采取了措施，进行了投资。《高家村》英文版1999年出版，所以中国农村情况后来的改善没反映出来。2007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再版简便本的时候还是保留了英文版原来的时间跨度。没能反映后来的变化是不理想的。再者，很多《高家村》的读者都想知道高家近期的情况。为此，《高家村续》正在写作之中。

最后让我借中文版出版的机会鸣谢。首先要感谢的是高家村的乡亲们。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他们一辈子过着沉重悲辛的生活，但是却态度坦然，乐观向上。书中提到的他们虽然大多是文盲，但他们的智力和聪明一点也不比我所认识的中国精英差。他们过去有，甚至现在还有很多我并不以为然的习惯和行为，但他们的“素质”丝毫不比我所知道的“先进”西方国家里所谓文明公民的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弟弟高常献，因为他实际上做了我研究高家村的助手。我也得感谢将原本英文翻成中文的章少泉教授。读者一看就会同意章教授的译文无懈可击。不但行文流畅，而且保留了原来英文的风格。我也要感谢同时兼职于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何吉贤博士。何吉贤博士不但在2011年组织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的一些年轻学者和研究生的读书班通读了《高家村》，还帮我做了中文版的译校工作。刚刚在阿德莱得获得博士学位并得到研究生院院长优秀论文奖的谢葆辉也抽出时间为本书的最后定稿做了细致的工作。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谢茂松和林骁的敬业精神为这本

书的出版出了大力。当然还有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其他同仁们，在此我一
一衷心感谢。最后，感谢出版社邀请的两位评审学者对本书的肯定和推
荐出版。书中有根据他们宝贵意见作出的修改，但是如果书中有错的
话，当然是我而不是他/她们的责任。

2013年4月24日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資料

英文版序言和致谢

本书写的高家村，是我的家乡，生我养我的小村庄。我在那里出生、长大，直到1973年21岁时才离开这里到厦门大学学习英语。在厦门大学的四年里，我每年回家乡一次。1977年我离开中国远赴英国求学。1980年，我又回国到厦门大学教英语，这样与家乡接触的机会才频繁起来。但1985年我再次离开中国，又在英国生活了五年，之后移民澳大利亚。1992年，格利菲斯大学的一个科研项目使我能够再次踏上回家的路，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小村。后来我又分别在1994、1995、1996、1997年回家看过多次。我有一位弟弟目前还生活的高家村。在离开高家村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保持着与村子里的联系，关心着村里点点滴滴的进展。

交代这些背景的目的，是希望能告诉大家，我写作书的个人兴趣和情感。确实，在努力思考如何写作这本书前，我还没有想到自己与高家村的联系有多深。是像标准的学术著作那样，采取旁观者的、不融入丝毫个人的情感的客观叙述，还是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也包含在文本中？是把书写成一本半自传，还是完全非个人性的著作？在什么程度上，个人经历的涉入会不利于客观的分析？个人的经历会不会给批判性分析增添更多的真知灼见呢？

既然有意避免个人经历的涉入显得刻意且最终难以做到，那么，我决定干脆采取一种个人化的叙述视角。然而，正如读者在阅读中将会觉察到的那样，这一选择也常常会带来许多的冲突和困难。作为一位大学教师，我希望本书不仅与我的学术领域有关，我还希望它能表达一些重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因而，在章节安排上，每一章都围绕一个主题来写，如教育、医疗卫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书中的统计材料，在使用和分析时，我尽力做到与本领域的现状相关。作为一位曾经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农村生活的高家村村民，我的这一经历是本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叙述的过程中也包含了不少与主题相关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和经历。

自我来到“西方”，¹成为一名华裔外国人后，我阅读了大量讲述、研究中国的书籍和资料。“西方”任何有关中国的评论，无论是谁说的，都会引起我的兴趣。这是一个自我觉醒、自我认同的过程。我欣赏并努力学习英语学术界所用的分析方法和技巧，但也意识到，个人的经历不可避免会影响到自己对人、对事或对现状的感知、阐释和分析。

在高家村的那些年，甚至自我懂事和对选择有朦胧的意识开始，我总是感到孤独、无望，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我想去工厂做工，去部队当兵，只要能离开村子，做什么都行。我憎恨这里夜晚的一片漆黑、冬日的严寒、夏日的酷热，还有那无休止的繁重劳作。这里是那么脏乱，道路泥泞不堪，还有很多的“迷信”事。这一切，那时在我看来是那么的落后、那么令人憎恶。然而，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却感到有种奇怪的依恋，牵挂着这一切。每次在伦敦或纽约的街头，我遇到乞丐讨钱，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省下钱来给高家村的这些村民。每次想到女儿可以把这样那样的文具和各种食品当成无所谓必需品时，我禁不住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高家村的其他小孩。

我已在西方国家生活了多年，然而，我每次梦中出现的情景都或者是以高家村作为背景，或是有西方背景的高家村的乡亲。对中国主

流知识分子与西方一些学者和主流媒体就中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许多事的态度和多种解释，我感到不以为然。我开始觉得，由于个人的经历不同，这是不能避免的，也无法避免。本书或含蓄或明晰地反映出我的这些忧虑。

本书的写作是在我的个人调研、回忆和经历的基础上完成的。写作期间，我找出以前的日记和信件，多次拜访高家村的众多村民，和他们聊天、讨论。我尽力找到每一份有关高家村和村民的文字资料，甚至包括当年生产队的帐本。过去五年来，我经常与我的弟弟高常献写信，问他一些过去和现在村里的事、村里的人。这些问题都有好几百个了，都是以前自己在那生活时从未想到的。高常献又转而问其他一些相关村民，尽可能地回答我的这些问题。本书中高家村的故事就是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

致谢

离开别人的帮助，实质上任何人都无法独立完成一本书，这本书所写的人在现实中与我密切相关，因此我需要感谢的人尤其多。高家村村民，他们超人的适应能力、毫无保留的善良和热情，时不时表现出的惊人的被动性，他们的谦恭意识，他们远未被认识被开发的聪明才智，是本书得以呈现的最终灵感的源泉。这本书能行世，应归功于高家村的乡亲。

我的很多朋友也对本书的成形提供了帮助，戴维·劳埃德(David Lloyd)自身事务繁重，但还是阅读了两遍本书的初稿。戴维在三大洲学习和工作过，他兴趣广泛，从政治学到文学，从日语到亚洲文化和宗教，都在他关注的范围内，他的意见和建议总是让我受益匪浅。

其他提供了帮助的朋友和同事还包括彼得·利索沃斯基(Peter Lisowski)，他是一位中国和中国事务的敏锐观察者，总是能给我提供洞见和鼓励；还有琼·安格尔(Jon Unger)，他在中国研究和学术书籍编辑

两方面都造诣颇深，犹如深山宝藏，值得每一位作者前去一探；还有麦卡林(Colin Mackerras)，他不仅对中国有深切的了解，而且对那里的人民也有理解之同情，他总是能给你提供专业上宝贵的建议和评论；还有威姆·沃瑟姆(Wim Wertheim)和玛利亚·弗鲁彻(Maria Flutsch)也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校正了书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提供了宝贵的评论意见。当然，书中所有的错误或不当之处都应由作者承担责任。最后，我想感谢一下鲁宾·特鲁(Robin Trew)和阿德里恩内·佩蒂(Adrienne Petty)为校读本书付出的劳动。

我对克里斯托弗·赫斯特(Christopher Hurst)的感谢超越了一般对出版者的谢意，因为他在与我——当时还是一位籍籍无名的讲师——见了一面之后，就决定与我签订一份出版合同。从那以后，他和迈克尔·德维尔(Michael Dwyer)就成了为我提供持续不断的鼓励的源泉。

1998年9月于塔斯马尼亚，霍巴特

注释

- 1 “西方”这里指的是说英语的国家。我得承认，我对非英语国家知之甚少，因此本书中的“西方”这个词仅限于英语国家这个意义。